

新质生产力与耐心资本

温铁军, 白天一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推进质量效益型增长的绿色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耐心资本是生产关系层面为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对各类生产要素具有组织作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结合起来,从更具根本性的生产关系层面探讨耐心资本对于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作用。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发生决定性作用的内因在于其原初培育成本主要由耐心资本承担,而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收益分配过程本身决定了其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在耐心资本支付生产力培育的原初成本之后,若由投机资本主导生产关系的形成,则势必生成“资本增密排斥实体+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的制度体系。唯其如此,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应以耐心资本为主导。在中国特色体制下,新质生产力得以发挥创新作用的重要条件有二:一是我国实体产业结构完备可消化技术创新成本,二是耐心资本大量投入于基本建设并由国家长期承担投资风险。当务之急在于构建新质生产力与耐心资本结合路径及时发育社会企业,使之成为适配性微观主体,以期进一步发挥以上两个条件对于消化技术创新成本的作用。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耐心资本;技术研发;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5)08-0063-10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atient capital

WEN Tiejun, BAI Tianyi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that promote quality-and-efficiency-oriented growth. Xi Jinping has emphasized that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ust be adapted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Patient capital represents an adaptive adjustment at the level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imed at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t plays an organizing role in various production factor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Marxism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s of productive-force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the role of patient capital in constructing a new-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more fundamental level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internal cause of the decisive rol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 that their original cultivation costs are mainly borne by patient capital, and the input-output and income-distribution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mselves determine their regul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after patient capital pays the original costs of productive-force cultivation, if speculative capital domin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generation of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收稿日期:2025-02-18 修回日期:2025-07-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产品多元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机制研究”(21AZ125)。

作者简介:温铁军(1951—),男,河北昌黎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capital-intensification excluding the real economy + technology-intensification excluding labor". Therefore, the new-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required by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be led by patient capital. Under the Chinese-characteristic system,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play an innovative role. First, China has a complete real-industry structure, which can absorb the cos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cond, a large amount of patient capital is invested i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state bears the investment risks in the long-term. The top priority is to construct a path for the combination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atient capital, and promptly nurture social enterprises to make them adaptable micro-entities, so as to further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above-mentioned two conditions in absorbing the cos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atient capital;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relations

一、引言与问题提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战略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2024 年 1 月 31 日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将“发展耐心资本”列为“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的重要举措。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4 年 1 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决定其应该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生产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的

革命性变革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跟进变革,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核心是资本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本质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而以耐心资本投入于技术创新则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耐心资本能够发挥其对各要素的组织作用,促进生产关系层面朝向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适应性调整,且此类新型生产关系的调整也内生性地要求微观主体的适配性演化;二是耐心资本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是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特点的国家实现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手段。

已有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开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内在特征,对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的适配性展开分析,对耐心资本在新质生产力市场培育阶段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2]、为技术创新提供风险分散和分担支持^[3]以及在微观层面对企业 ESG 表现^[4]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但尚未从更具根本性的生产关系层面探讨耐心资本对于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作用。因此,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结合起来,分析耐心资本主导构建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现实路径,对于在实践层面有效动员和引导资本力量服务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战略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底层逻辑:以耐心资本为主导构建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应以耐心资本为主导的底层逻辑在于,真正构成新质生产力

对生产关系发生决定性作用的内因,是原初技术研发从0到1的过程。即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收益分配过程本身,决定了其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作用。

1. 技术进步的原初成本一般由耐心资本支付

耐心资本长期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投向国家战略领域。一般而言,世界科技进步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内生的恶性竞争而产生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冲突实际上是技术创新最好的试验场,炮弹的弧度计算、航空器飞行试验等客观上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这类技术创新成本主要由国家承担。最终决定国家成败的耐心资本只有长期投入才能支撑得住军品、军转民带动民品发展的技术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苏争霸的冷战地缘政治格局之中,美苏两国在技术路线上形成了两套体系,各自都是以耐心资本来支撑不同技术路线的技术创新。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战略佯动,苏联遂以举国之力投入航天技术研发。但在同期,美国主要投向服务于军事通信的IT和与之配套的计算机技术研发。

同样,在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实际上采行国家资本主义,以中央财政为主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的耐心资本集中推动国防建设,支持军事技术研发,建立8个工业部主导对军事工业和技术研发的持续投资及成果应用,形成了国家资本为主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21世纪进入生态文明战略转型阶段以来,国家财政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和“三农”领域各项支出不断提高,从2012年的11 973.88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23 948.46亿元^①。为农村空间生态资源等新生产要素转变为绿色生产力历史性地奠定了“重资产”基础。可见,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耐心资本对原初技术研发成本的足额支付并不是单一追求经济回报,而是意在巩固与国防和战略调整相关产业,以在国家为单位的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 一般资本投资的风险难以被市场自身直接消化

国际经验表明,耐心资本在“0-1”之后的退出路径,包括军转民等产业化开放方式,都关乎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能否协调发展。冷战期间,苏联以举国之力投入航天工业技术研发,但其军重工业为主的产业资本缺少下游民用工业的结构偏差难以消化航天工业高科技研发的高成本,使其作为耐心资本的国家投入只有进入而难以退出,更难以收回成本,军重工业强大但民生经济匮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也成为最终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而同期的美国也是以国家资本投入IT及计算技术研发,用于统一指挥其分布在全球的军事体系;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单极霸权,IT技术研发成果转为民用,且由于原初技术研发成本已经由军费支付,由此蕴含巨大的机会收益空间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必须依赖的信息革命。同期,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带动大量海外投机资本流入美国也是为了追求产业信息化的机会收益,由此使风险投资成为主导该技术路线下军转民技术拓展的资本力量。一方面,与同期产生的几千种衍生品推进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势必排斥流动性差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由军工联合体与金融资本集团内在捆绑而构成具有内生政治利益的“deep state”。这可以说是技术进步带动生产关系变革的一种典型,也可以说是为后续投机资本融入金融虚拟化扩张构建出了路径依赖。

诚然,美国信息产业技术研发的原初成本,是由耐心资本支付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投入中占据主要地位,为美国技术研发提供了超过90%的资金。20世纪90年代苏联阵营解体使军方长期投入形成的军事技术转为商用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机会收益空间,带动逐利为本的世界金融资本流向美国,资本市场上的风险投资超过联邦政府成为技术研发的最大投入方。此后,美国联邦政府投入的研发资金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2022年这一比例已下降至18%^[5]。客观地看,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诱因也是“金融排斥实体”——东亚各个经济体原来支撑实体产业的金融资本析出本土、流向美国,追求这个军事技术转为商用的历史性的机会收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

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一方面支付了研发成本,推动了美国技术创新及跨国资本对实体产业核心技术的控制,使得美国成为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引领者。另一方面,美国实体产业利润相对摊薄导致其大量移向海外,更多地是得益于海外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低谷被外部投资而获取“资本化”收益。由此,美国在 1990—2010 年的 30 年里,都是全球化的主推手,也是主要获利者。

当前美国资本市场中市值排名前 7 位的头部企业全部集中于科技领域,包括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亚马逊、特斯拉和 Meta(由 Facebook 改名而来)。据《Kobeissi Letter》报道,2024 年 6 月,被称为“美股七巨头”的美国七大科技公司总市值突破 15 万亿美元,占美股 20% 左右,相当于美国 28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多半。

这一方面意味着在军事技术商用化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促成的资本市场头部企业为获得对未来预期增加值收益最高评价而只能不断推出相关创新的“题材”,由此形成股票市值最高;另一方面,也促使美国以资本市场大量吸纳全球资本演化为“IT 泡沫”来支撑对技术创新的资本流入,如金融资本集团虚拟化扩张支撑高技术资本集团造成的“IT 泡沫”导致 2001 年“新经济危机”。

可见,单纯强调科技进步而忽视在耐心资本作用带动下“人机环”的系统协调,并不必然促进生产关系的积极变革。美国以资本市场风险投资追求科技领域垄断性的高收益,内生性地形成“两个排斥”:一是强化了“金融扩张排斥实体”,二是“技术创新排斥劳动”。在美国,表现为产业衰败州的“红脖子”群体深陷失业困局及社会两极分化演化出的街头暴力与族群文化“撕裂”日益恶化。

国际投机资本的风险很难被资本市场自身直接消化。于是,为了维持高风险投资的高收益,遂产生了一系列有利于投机资本收回技术创新成本并获得高收益的国家战略,包括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制度安排。高新技术研发的沉没成本较高,所以投入技术研发领域的资本面临的风险较高。其一,技术研发的专用性投入成本高,包含人力成本和设备材料成本等。其二,在信息技术领域,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资本投入方如果在技术研

发后期被新技术超越,已投入的资金回报率就会因技术迭代而很快转为负值。其三,应用高新技术产品要在市场中达到一定的用户规模 and 市场份额,还需要投入市场推广成本、市场培育成本等。因此,为了维持高风险投资的高收益,美国 and 西方都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甚至靠军事霸权及冷战意识形态,强化已经形成的技术垄断,排斥后发国家的科技创新及自主研发。比如美国推动构建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专利保护期限等进行了规定,各成员需对药品专利提供一定期限的保护,这使得美国制药企业在全世界市场上能够凭借其专利优势,在专利保护期限内形成市场垄断,获得超额利润,极大地保障了美国制药企业在全世界市场的利益^[6]。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的低端制造业阶段所形成的模仿再造的技术复制路线就很难再形成,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必须支付极高的专利费,以及很多关键设备的特殊使用费,这就使后发国家的低端产业几乎不可能提高资本积累率来支付研发成本。于是,高资本+高技术共同维护垄断,就成为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益水平的重要制度体系。这也是全球贫困成因的 70% 源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的内因之一。

3. 技术进步与风险投资结合对劳动和实体产业产生双重排斥

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的底层逻辑,使金融与技术两大资本集团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获益者,共同对实体产业和劳动产生双重排斥。本文认为,这是美国西方在产业升级阶段缺乏耐心资本的高风险技术创新所派生的规律性后果。

其一,资本进入金融扩张阶段发生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是客观规律。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升级,金融资本迅速扩张,一方面外汇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本国货币也大量增发,无法完全被实体产业容纳。资本虚拟化扩张能够短期就产生巨大的、远超实体产业的收益,带动全球资本因其逐利本质而流出实体,即如果金融资本收益过高、扩张速度过快,就会对实体产生排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

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7]。当资本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地产资本金融化等虚拟经济领域能获得更高利润时,资金作为被投资回报率所决定的最具流动性的要素就会从利润较低的实体经济部门流出,而实体经济就会遭遇资金短缺,甚至难以进行简单再生产。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逐步演化为八成以上GDP来源于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制造业下降到低于12%,农业低于2%;大量劳动密集型实体产业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主要是移出到劳动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生产要素价格较低的国家,开始是墨西哥、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苏联解体后客观形成美国单极霸权主导“一个世界一个体系”,遂有中国、越南等成为接受西方低端产业转移的主要经济体。同期,美国实体产业持续衰退,为使被动移出的产业资本得以持续获利,当政者并不认真深究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直到中国凭借完整产业结构和最大工业生产能力形成全球竞争力,才有“怀璧其罪”“动辄得咎”的境地。

金融资本阶段全球化竞争的“微笑曲线”^②表明,处于两端的金融资本国家和拥有资源主权的出口国因占有货币租和资源租而获得较高收益,处于中间“低谷”位置的加工制造业国家却只能被动消化“输入型通胀”和“输入型通缩”,致使其低端产业的外贸盈余实质是环境租和劳动力租大量流出。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后,美国以“量化宽松”名义大规模增发货币,成倍地推高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制造全球通胀,拥有资源主权并且大量出口的国家尚能分享价格上涨的收益,而依靠“大进大出”才能维持经济增长的加工制造业国家因此遭遇“输入型通胀”。当美国西方结束“量化宽松”之际,则全球财富缩水、原材料价格陡降,致使生产型国家遭遇“输入型”通缩,通常表现为海外需求下降,外向型企业倒闭,失业增

加,内需乏力。

其二,数字化创新并没有脱离金融资本阶段的规律,而是深度再现“微笑曲线”。在美国资本市场中,技术进步的收益主要由资本方和技术方占有,技术创新体系支撑着AI应用的高附加值,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维护着GPU制造和云计算的高附加值,而处于中间底部位置的大模型(也称基础模型),人力投入大却收益低。大模型的发展主要靠实体产业支撑,如需要芯片、服务器等硬件产业提供计算和存储设备,需要数据标注、数据采集等实体业务来获取高质量数据,实体产业大量流出则深化了“微笑曲线”造成的两端高收益的不平衡,如果没有耐心资本做跨周期投入,则在一般市场条件下金融对实体和技术对劳动的“双重”排斥,也会进一步加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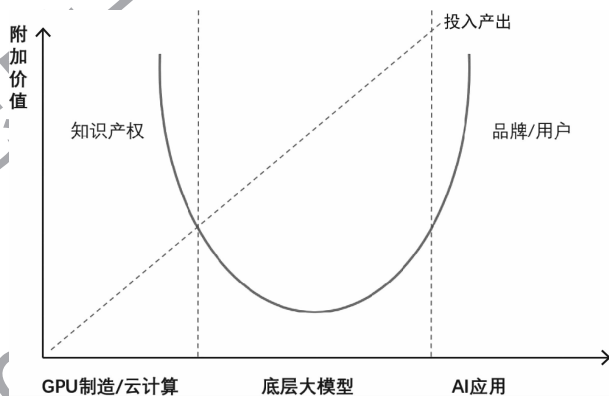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化阶段微笑曲线内在的收益不公机制

高资本平台与高技术平台“双高”紧密结合,只容纳少数精英群体就业。客观上成为美国两极分化加剧和社会严重撕裂的动因。

美联储2021年家庭财富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超过30%的国家财富,而底层50%的家庭仅拥有约2.6%的财富,前0.1%的富人的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196倍之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与此同时,随着实体产业流出,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受到严重挤压,失业率居高不下。2024年9月,美国长期失业人数占

② 金融资本阶段全球化竞争中的“微笑曲线”的实质是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系统性转嫁制度成本。在“微笑曲线”两端,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霸权国家,控制货币、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权,通过虚拟资本扩张获取“制度收益”,资源主权国家(如石油输出国),借助资源短期涨价获取“搭便车收益”,但若资源被跨国资本控制则承受主权“负外部性”,而处于底部低位的制造业国家,承担实体生产却承受最大制度成本,被迫压缩劳动力与环境成本以维持出口竞争力。

总失业人数的比例达 23.7%^[8]。深陷债务危机的政府受制于“深层政府”无力增加耐心资本,既不可能重构有利于实体经济的生产关系,更无法改变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趋势,只能在高技术维护军事霸权的同时促进华尔街模式强化跨国投机资本“野蛮生长”,跨国公司为主的金融精英集团只有维持美元“高利率”政策,才能借虚拟化泡沫经济对海外“潮汐收割”获利。

三、耐心资本主导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

1. 国家生态化战略转型过程中产生大量新增租值

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在于服务国家阶段性战略转型。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9]

2012 年以来,国家针对两个阶段性变化推进国家生态化战略转型。

一是世界经济从短缺阶段进入过剩阶段。须知,全球化解体的内在原因是全球资本过剩。美国在金融资本阶段的虚拟化扩张无以为继,势必向产业资本回调,而中国正处于产业资本结构化扩张阶段。由此,中美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对抗性矛盾是全球化解体的主要矛盾。从中国内部看,在全球化解体的挑战面前国内所发生的主要矛盾也是生产过剩。其实第一次过剩发生在 1998 年。因为,1997 年东亚金融风暴使外需陡然下降导致沿海低端制造业大量停产歇业,即为中国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源^[10]。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央陆续提出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 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 年)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9 年),以期缓解工业、农业、金融三大领域的过剩问题。

二是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严重。在粗放数量型增长阶段,城市化激进扩张致使大量耕地被占为工商业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等城市建设。许多城市在扩张过程中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沿海地表沉降,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功能减弱,而且在此过程中造成过量能源消耗和过重环境污染。众所周知,粗放数量型增长难以为继。为此,中央提出向“质量效益型”做积极调整。此前,2012 年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5 年 3 月发出《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正式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进文件,“两山”理念成为国家生态化战略转型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是生态化战略转型的基本内涵。这五大特征具有内在逻辑,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人口规模巨大”的“广土巨族”追求“共同富裕”,需要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道路,才能“和平发展”。为此,全民参与的伟大斗争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生态化转型的伟大复兴。

据此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新”与此前国家领导人确立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三新”具有内在一致性。由此来看,能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是判断生产力质态“新”与“旧”的关键。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底色,新质生产力主要是能有效开发两山资源的生产力,对与之相悖的生产力,则应该推动其进行绿色转型,具体方式是国家领导人要求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生态资本深化。

在生态产业化是空间资源价值化的过程。其中,势将产生大量资源租。在以粗放数量型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我国环境租和劳动力租随低端制造业产品大量出口而流出;随着生态化战略转型加速推进,主要分布于农村的县域空间生态资源应该成为绿色生产力的主要开发对象,具备了被康养、文化、旅居等三产需求重新定价的条件^[11]。世界经济论坛的《新自然经济系列报告》预估,全球的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目标是到 2030 年,在三大关键社会经济系统——食物、土地和海洋利用、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能源和开采中实现自然受益型转型可以释放价值 10.1 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而其中约 20% 将发生在中国^[12]。换句话说,未来 5 年中国生态经济领域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会形成约 15 万亿元的经济价值。

2. 耐心资本主导的完备产业结构可“摊薄”技术创新成本

实体化产业结构完整有利于技术研发成本在产业扩张中伴随产业链的平均收益率而被消化,

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中的良性包容发展。

我国高度重视金融服务于实体产业发展,构建了耐心资本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基础。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再次予以强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要求“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实现跨周期发展,提高在全球产业链和技术体系中的地位,从粗放数量型增长阶段的“中低端大量代工—技术受制于人”模式转出,我国于2015年推出首个国家级制造强国战略,国家财政和国有金融作为耐心资本的主要力量,向“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推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目前,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业规模。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13]。中国政府参照联合国分类标准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显示,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完备的产业链。完整的产业结构和深厚的产业基础,对于消化技术研发成本具有基础作用。

一是完备的实体产业为技术研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在一项新技术被研发出来后,能够在多个相关产业中找到潜在的应用机会,从而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中分摊技术创新的成本。并且,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够加快技术迭代速度,在实际生产和应用中不断改进,提高技术的成熟度和竞争力,从而使技术研发在更短时间内得到回报。

二是技术研发可以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之间进行传递和扩散,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和创

新,使得研发成本在产业链上得到合理分担和消化。三是完备的产业结构能够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因产业结构完备,各个产业之间可以相互支撑,面对内外部风险叠加时,具有更强的韧性和适应性,能够降低技术研发的风险成本。

中国雄厚的实体产业基础对消纳技术研发高成本具有客观作用,实体产业结构越完整、厚度越大,其消化技术创新成本的能力就越强。以风电产业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风电市场和制造基地,2023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76.34 GW,占全球新增装机的50%以上。新能源企业通过规模化生产和技术创新,降低了风电机组的制造成本和研发成本,提高了风电项目的投资回报率。

这意味着,我国能在参与世界实体产业竞争的过程中,依靠本国结构完整、基础雄厚的实体产业消化技术创新的成本,而不必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投机资本支持技术创新带动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技术路线。这也是我国确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和平发展”的底层逻辑。

四、与新质生产力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路径

技术资本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内生性矛盾是“技术增密排斥劳动”,其与2018年贸易战以来西方制裁加剧互动,使“无根外资”^③加速移出造成失业率上升,直接影响社会安定。美西方已经进入金融资本阶段,资金要素在金融经济阶段的内生机制是“流动性获利”,其投机性使短期资本集中于虚拟经济。如果按照华尔街模式,必然出现资金离开流动性差的实体经济,必然“野蛮生长”“无序扩张”^④,进而加剧两极分化。基于此,需要理解并且坚持集中体制下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看得见的手调配国家资本率先转化为长期性、可控性的耐心资本,带动国资民资相互借鉴转型为社会企业,才能支持新质生产力推进实体经济所需要的生产关系调整。

③ “无根外资”具有持续流向边际收益更高的区域的逐利特征。其行为模式体现为:仅以劳动力成本、环境监管宽松度为选址标准,无视产业链协同与社会责任;不参与当地技术升级或人才培养,无长期产业布局规划;过度消耗资源环境,撤离后遗留就业缺口与生态修复成本。

④ 2020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1. 充分发挥耐心资本的社会属性

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耐心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私人逐利性,带有国家战略内在的、促进整体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共目标,是国家资本与政府关系在更高层次对社会化大生产,尤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种高度社会化活动需求的回应。

我国处于金融资本阶段全球化竞争的“微笑曲线”的“低谷”位置。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14]应用于金融资本阶段全球化竞争的分析可知,美、欧、瑞、英、加、日处于金融资本核心。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美、欧、瑞、英、加、日 6 家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15],在美元短缺时,可用本币为抵押向美联储获取美元流动性,在约定的未来时间以同样汇率换回并支付一定利息。2013 年 10 月 31 日宣布将原有的临时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无限额、多边的互换协议,有流动性需求的央行可按协议规定获得来自其他 5 家央行的 5 种货币流动性。2023 年疫情时期,美联储和澳大利亚、巴西、丹麦、韩国、墨西哥、挪威、新西兰、新加坡、瑞典等硬通货 9 国央行建立临时美元互换机制;在这类金融资本核心形成之际,其他参与“友岸贸易”的国家或为半核心,“近岸贸易”国家则为“半边缘”。相应地,被美国作为敌对国家的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只能是被排斥的“边缘”。这个体现金融资本阶段西方利益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势必内在地使其排斥性演化为各种敌视边缘国家的制度和规则。

为此,我国以全面生态化战略作为在全球化竞争中推动“跨周期”转型来提升收益的对策。这就要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传统的工业化竞争阶段改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提高本国环境租和劳动力租。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带动的生态资源价值化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新增租值,若能通过重构生产关系来集中租值并对其进行符合“空间正义”的分配,则可有效拉升我国在全球化竞争“微笑曲线”中的位置,这也是对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内具有的客观规律的一种解读。

数字化是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重要手段。因为生态资源具有“生命共同体”的内在特质,属

于典型的非标准化、分布式、多元化特征。“十里不同俗,指的就是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千差万别。对此,唯有数字化技术可以对生态资源进行全面、即时的计量,使千差万别的生态资源得以被感知、被描述、被数字化处理,进而对生态资源不断变化的价值增量做出系统性评估,将其转化为可被货币化的价值体系。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社会参与、发展社会企业,才能推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资本深化。

值得强调的是,“在地化(或称本土化)”知识发掘和深度“社会参与”有利于新型生产关系形成,也能够有效地降低数字化阶段“微笑曲线”内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收益不公正机制,其制度改进效果则表现为上文提到的“微笑曲线”更加平缓,中间的大模型环节附加值提高,进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附加值,间接地提高各大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生态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能够为底层大模型提供更多高质量数据。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往往会产生正外部性,如生态化发展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能够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借助社会参与创造的氛围更多发育社会企业,或鼓励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型;利于推动生态产业化,也能够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数字化阶段微笑曲线内在的收益不公程度的降低对于提高数字化产业链韧性、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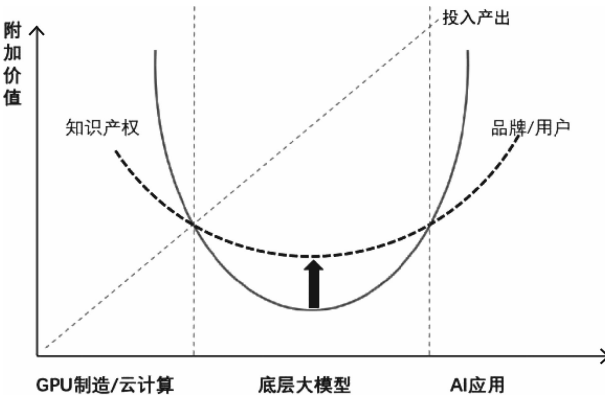


图2 数字化阶段微笑曲线内在的收益不公改善机制

2. 以社会企业作为承接耐心资本的微观载体

新质生产力对应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是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其角色定位和制度要求随生产关系调整持续演进。从传统上市企业被定义为“公众公司”强调中小股东利益,到强调“企业社会责任”(CSR)关注多元利益相关方,再升级为ESG(环境、社会、治理)的量化整合体系。这一过程体现了企业适应新型生产关系、平衡经济与社会价值的深层转型。近年来,大企业ESG整体披露率快速提升。2023年A股ESG报告披露率41.37%,较2021年的21.17%成倍增长^[16]。

耐心资本与社会企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在对接过程中形成战略性调整的主要动力。

首先,耐心资本与社会企业的发展目标都是追求包容性的可持续的综合效益,而不是单一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耐心资本的投资策略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为主,倾向于支持能够给社会、经济、环境等带来正外部性的项目。社会企业强调“经济回嵌于社会”^[17],具有重塑新型社会关系的作用,企业化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是立意于社会发展与革新,追求社会和集体的公共目标^[18]。

其次,耐心资本与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径都具有包容性和综合性。在全球需求下降造成“输入型通缩”、中国经济由短缺转为过剩的压力下,投机资本逐利本性使之逃离实体经济,成为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的动力。近年来,在有些领域的政策选择上经济效益已经让位于经济安全,企业微观利益不可能短期顺利产生^[19]。耐心资本的“耐心”特征也体现为投资周期较长,在市场波动中更具稳定性,不追求短期的投机性收益。而与之适配的、作为微观主体的社会企业则以社会经济可持续与良性治理体系建设为己任,推动企业在地化与所在地社会的双赢及生态化协调发展,在不利经济环境下能够以激励相容来实现内部化

机制化解外部性成本,进而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发展目标。

3. 以耐心资本推动社会参与式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

要素配置方式最终体现在收益分配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拉大是我国生产关系领域日益严峻的问题,这就需要国家资本作为耐心资本推动社会参与式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突破以精英结盟和精英俘获为内涵的“利益固化的藩篱”^⑤。

为优化符合生态产业化的要素配置方式,把过去的资本野蛮生长改为以耐心资本为主对接社会企业的质量效益型增长,依托国家生态化战略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增量租值重构新型生产关系,要善于利用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与村域地缘边界相重合的特点,推进以村社为载体,以县域为资本闭环的空间,以耐心资本为引领,数字化与社会参与结合推动生态资源价值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村域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微观主体是公司化改制的新型集体经济,乡村丰富的绿色生产力蕴含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之中,具有空间整体性,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要求以村为主体利用开发。通过“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客观上使集体经济占有整合村域资源推进整体开发的天然优势。

应以中央强调的“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为抓手,同步借鉴“农村集体产权交易所”通过竞争发现价格的市场机制,为资源性资产价值化实现奠定合规产权流转的制度基础的创新。在生态产业化运作上,要重构利于“劳动者联合起来自主支配他们自己的小额资产”的合作社经济的配套政策。借此,才能以耐心资本因地制宜推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是强化“三变改革”对整合域内资源的作用。针对村域空间生态资源属于生命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特点,在深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中以“资源变资产”的参与式股份化整合村内由农户分散持有的资源。二是组建县域合作经济实体,统筹县—乡—村三级股份化的集体资产运营。一般应设立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包括县内国企作为耐心资本牵头组建乡村振兴投资开发平台,作为落实党政一把手推进乡村振兴的市场抓手。通过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股权设计,整合县域范围内的生态资源,统筹县域生态资本深化。三是推进由政府设立耐心资本控股的数字化交易平台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以此落实“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县域产业收益”的政策要求,既可弱化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对实体产业和劳动的双重排斥,又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在地化的新型生产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只有发展向生态化转型的新质生产力,才能完成“粗放数量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新阶段跃迁。为此要在“两山”新理念的指引下形成“数字化+生态化”的“新结构”。这就尤其需要有助于耐心资本重组要素结构的深化改革,来推动新型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适配性调整,同步构建“社会企业”作为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2]潘爱玲,李广鹏. 耐心资本与数据市场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理论与改革,2025(3): 140-153.

[3]洪银兴,姜集闯. 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J]. 新华文摘,2025(6): 49-54.

[4]李思飞,温磊. 耐心资本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J]. 经济问题,2025(1): 48-56.

[5]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美国研发趋势与国际对比分析[R]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SF),2024:3-7.

[6]杨军. 医药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的冲突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6.

[7]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郭大力,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94.

[8]美国劳工统计局. The economics daily: long-term unemployed accounted for 23.7 percent of total unemployed in September 2024 [EB/OL]. [2024-10-04]. <https://www.bls.gov/>.

[9]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郭大力,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4.

[10]温铁军,等. 八次危机:1949—2009 中国的真实经验[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54.

[11]温铁军,逯浩. 深化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认识[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10): 31-39.

[12]世界经济论坛. 新自然经济系列报告:中国迈向自然受益型经济的机遇[R]. 北京:世界经济论坛,2022:25-50.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发布会[EB/OL]. [2024-07-0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2084.htm.

[1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 郭方,夏继果,顾宁,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70.

[15]美联储. Central Bank Liquidity Swap Lines[EB/OL]. [2020-04-15].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greform/reform-swaplines.htm?use_xbridge3=true&loader_name=forest&need_sec_link=1&sec_link_scene=im.

[16]A 股 2024 年 ESG 信披率达 41%,2025 年强制披露量或大幅提升[EB/OL]. [2025-01-08].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50108/herald/0f4c846d9f395f6141a54c187da6a1fd.html>.

[17]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67.

[18]杜洁,张兰英,温铁军.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的本土化: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为例[J]. 探索,2017(3): 138-143.

[19]温铁军. 生态文明转型召唤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张謇的启示[J]. 文化纵横,2019(2): 91-97,144.

(本文责编:希 文)